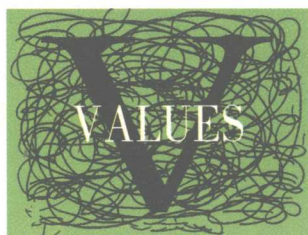


人文译丛
总主编 ◆ 何怀宏

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书系



[印]阿玛蒂亚·森 / 著
杨茂林 郭 婕 / 译

资源、价值与发展

Resources, Values And Development

吉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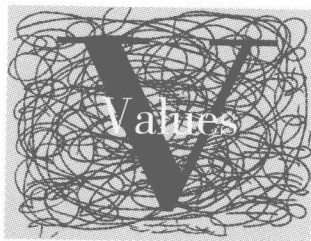
人文译丛
总主编 ◆ 何怀宏

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书系

[印] 阿玛蒂亚·森 = 著 杨茂林 郭 婕 = 译

资源、价值与发展

Resources, Values And Development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源、价值与发展 / (印) 森著; 杨茂林, 郭婕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8.12

(人文译丛)

书名原文: Resources, Values And Development

ISBN 978-7-206-05848-6

I. 资… II. ①森… ②杨… III. 资源分配—研究 IV. F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6420 号

资源、价值与发展

著 者: [印]阿玛蒂亚·森

译 者: 杨茂林 郭 婕

责任编辑: 丁 昊

封面设计: 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 130022)

网 址: www.jlp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431-85395845 85395821

印 刷: 长春永恒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8 字数: 300 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978-7-206-05848-6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册 定 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曾经，在日内瓦，有个贵族问我是否喜欢文化。喜欢，我听见自己说了，但随后感到极其的愚蠢。那种感觉在写这本论文集《资源、价值和发展》时又有所重现。确实是很好的主题，但是不是任何的经济学都不能不涉及它们？让人一目了然的题目很难取，但从书名我们可以得知，这些论文主要是关于发展经济学的（正如人们平常所了解的），其中很多文章涉及到在发展中资源配置的各个方面，但更多关注的是在资源使用和评估中动机和价值的作用。

与前本论文集《选择、福利和量度》中的很多文章不同，本论文集集中的文章不是跟福利经济学直接相关。但福利经济学的视角却被广泛的应用。这样的视角影响分配原则和动机特点的评估（第一部分）、投资策略和贴现程序（第二部分）、影子价格和项目评估（第三部分）、全球不平等和国际转移（第四部分）、真实收入和经济不平等（第五部分）、粮食供给和权利失败（第五部分）、以及经济发展的本质（第五部分）。福利经济学的方法经常背离传统的经济研究范式，本书也包括一些对政策决定和资源分配道德基础的再评估的文章。

资源、价值与发展

除了关注传统资源分配问题，本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让人感到不舒服的主题上，包括不平等、剥夺、性别歧视、营养不足、发病率、饥饿和饥荒。这些描述性和预测性的分析方法细致地阐述不同水平上制度的特点，涉及国家层面、法律制度、工资制度、市场机制、家庭、甚至媒体和压力集团。

本书开篇是一篇较长的绪论。介绍的是不同主题间的内在联系和相关的文献综述。书中一些章节激起了相当热烈的讨论（以延伸、应用和辩论的形式展开），提及的很多问题在绪论中也多有涉及。

出版本论文集的想法（如上一本论文集《选择、福利和量度》一样）来源于巴兹尔·布莱克威尔出版社的雷尼·奥利维里，他再一次在选择文章和如何安排上，给予建设性的建议。对于帕特里西亚·威廉姆斯的鼓励和帮助性的建议，我表示由衷的感谢。

阿玛蒂亚·森

绪 论

许多经济学的论文是简洁而精致的；但有些并非如此。收录于本书中的论文显而易见地属于后者。这些论文涉及到经济发展的制度复杂性，资源配置理论的分歧部分，社会行为中价值的特殊作用，规范分析的矛盾和冲突，以及由于信息缺失和概念不明所引致的对理论和政策的挑战。

一些问题也要求超过人们经常以为的经济学边界，涉猎到政治、社会和哲学问题。这些经济学的边界，经常被狭隘地定义，包括象斯密或马克思这样的古典经济学家不会轻易地认可的一些区分。某些现代经济学似乎的确是建立在裁制女性紧身衣工匠那句古老的忠告上：“如果夫人所穿的衣服完全合适，那么她需要的是小一码的。”

1 制度与动机

1.1 非工资性制度与农民

工资制度的诞生是最近的事情。多少世纪以来，人们根据其他报酬制度，在狩猎、捕鱼、采集、动物驯养和土地耕种上辛勤劳作。

即使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劳动力还在按照很少涉及或完全不用货币工资的制度安排进行劳动。与此相反，在现代经济理论中，大多数严格根据工资制度来对待就业问题，而且在这种特殊的形式中来考察资源配置问题。当然，在这种对立中不存在任何神秘问题，因为多数现代经济理论把自己确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范围内，无论这种确定是明确表示的还是暗含的。在本论文集中，前两篇论文专门探讨了各种非工资性制度的分配逻辑——农民经济、二元经济和集体分配。

在我写于50年代的《技术选择》^①一文中，我就打算，在其他事情上，比较农民农业分配规则同工资取向的工业分配规则的差异。论文1（《农民以及有或没有剩余劳动的二元论》）在一个使行为最大化的明晰的分析框架内拓展了那种分析。当然，这个题目并不新奇，诸如查耶诺夫（Chayanov）等许多作者都提出过关于非工资性农业分配的模型。甚至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就争论说，“以自己的双手进行劳动的耕作者，都会把自己认为能够付出的最大劳动投入到他们的土地上，却从不仔细计算与这种产品相联系着的货币价值。”论文1中所应用和发展的关于农民分配的这种分析结构，接受了这种与利润最大化和货币价值计算的不同之处，但却没有把这种不同归因于那种不“仔细”计算的结果。相反，使家庭幸福概念的最大化被认为是农民分配的目的，而且制度约束也被视为有限交易。在此意义上，“仔细”计算能够而且确实在市场价格基础上导致与利润最大化不同的结果。

纯理论中的这种情况与明显让人感到困惑的印度农业调查数据有关。印度官方在50年代进行的，关于“农场经营”的研究产生了非常丰富的有关印度农业的信息。但是，他们却使得这些数据的解释凌乱不堪，因为他们试图根据估算的市场工资来计算家庭劳动，以使这些数据适合于工资经济的分析框架。例如，对于那种情况，

即“50%或者更多的农民正在亏损经营”，这些报告表示了“担忧”。当然，印度农业确实也有让人担忧的地方；但是，这种担忧应归于对输入概念不合情理地应用，也就是说，按照市场工资计算所有的家庭劳动，甚至在不存在这种就业选择情况下也这样做。即使做出特别修正以解释印度“农场经营”研究的结果（而且消除显然存在的困惑）不存在任何大的困难，但是在农民和混合农业中却需要一种更为完整的资源应用理论。论文1就是一种应对这种挑战的努力。它提出了一个完全的农民分配的结构（分别为产品有无市场和非劳动输入有无市场），以及与工资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企业共存的农民农业的二元经济结构。

在根据这样一种结构能够进行计算的各种回应中，总产出对部分劳动力退出的回应就是其中的一种（等式（37），论文1）。零回应的特殊情况显示出剩余劳动的存在——一个让人感兴趣和极具争议的问题。这种分析表明，与某些著名论断相反，劳动为零的边际产品对剩余劳动（或隐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的存在而言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它更主要依靠的是当部分劳动力出走后，所留下来的家庭每一个人被期望的增加努力的程度，等式（37）所要表示的正是这种关系。

这些问题在文献中已有大量讨论。我不打算在这里回顾那些广泛的讨论，但是，就该主题说几句话也许是合适的，以补充论文1所说的内容。首先，如果家庭的目的功能不能被分解为消费和享受两个部分，那么剩余劳动存在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就可能变得远不如等式（37）所推导出来的条件那样严格。事实上，这个观点是在论文1中提出的，但是为了把相同的消费边际效用与劳动边际负效用做为剩余劳动存在的必要条件，它已经在随后的文献中倾向于给忽视掉了。所谓必要，就是当某些劳动者出走后“实际劳动成本”不变，也就是说，收入与享受之间的替代边际率不变，而且甚至当边际效

用和负效用表各自不统一时，在假定二者相互联系（即存在着非零的“交叉偏好”）的条件下，情况也是这样。例如，如果更多的收入和消费（如更多的食物摄入）降低了劳动的强度，那么当人均劳动和收入二者均增长时，由于农民劳动力减少，边际替代率可以保持不变，甚至当收入边际效用保持一种常规性走低斜率和劳动边际负效用保持一种常规性上扬趋势时，也是这样。

其次，剩余劳动仅仅是一种特殊情况，“回应分析”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处理那种情况——尽管那种情况可能引起关注和具有争议。劳动流动导致农民经济中出现了许多调整，其中一种就是那些留下来的家庭成员的劳动时间的变化。通常情况下，也许完全不存在任何隐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而且与流动规模相比，净劳动努力在总体上的减少以及随之而来的净产量的降低的可能性不大。计算那些预期回应是可能的，而且这些计算的相关问题也不限于仅仅检查是否产出回应恰好是零或不是零的情况。

最后，正如论文1所讨论的，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特征，按照无差别劳动单位讨论问题会误入歧途的。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的任何一种进行处理，或假设严格的、不同季节劳动应用之间的比例（例如，收获时期劳动与种植时期劳动相互在比例上的走高或走低），或假设规定性互补（具有的一种劳动针对他种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的正交叉偏好）。在拓展这种季节情况回应性分析时，包括剩余劳动存在条件的回应性分析，没有任何大的难度。^②一个简单情况——就此目的是有效的——涉及到了每个季节里的完全的“实际劳动成本”（收入与享受之间的边际替换率）。

事实上，从经验角度看，剩余劳动如何的普遍和广泛，当然是另一个不同问题。某种显而易见的证据是，欠收季节的停工可能经常伴随着其他季节的高度紧张，收入和享受之间的无差别曲线极有可能与高峰季节的直线情况差之千里。论文1虽然未就剩余劳动的实

际存在及其规模提出任何主张，但却陈述了剩余劳动存在于农民经济之中的某些必要和充分的条件。更为普遍地，本文描述了这些回应关系以及那些回应大小所要依赖的参数。剩余劳动仅仅同接受分析的回应之中的一种特殊情况有关。

1.2 合作与动机

在论文1中，农民分配模型下的动机假设是简单的——甚至可能是天真的。所有分配都在使“家庭福利”最大化的目标指导下进行的，这被赋予了一种功利主义的形式。尽管在家庭内部也会有利益冲突（例如在主要参加农业劳动的成员和那些主要在家成员之间），但是这种模型却不允许这些冲突在决定农民家庭经济活动中起到任何重大作用。

同样地，这种动机形式经常被认为对于表现其它经济类型中家庭作用的特征也是合适的。例如，在涉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标准一般均衡理论（standard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中，家庭内部关系成了完全不相干的事情。这种理论大概就是建立在类似的某种简化的假设基础上。本论文集后面的一篇文章（论文15）批判性地评价了这种传统，而且其它论文（论文16、19和20）也进一步探讨了这些问题。稍后在绪论中，我仍将回到这个问题上。

尽管家庭内部冲突进入正式的经济学仅仅是相对近期的事情，但是，在诸如合作社之类的非工资性组织内部的冲突已经被广泛地讨论很长时间了。论文2（《集体企业的劳动配置》，1966年）就涉及到这个问题。它已明确地注意到了一致性利益与冲突性利益的结合，这些利益表明了合作分配问题的特征。论文2是从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之间的区别入手的——这种差异是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③的古典分析以后，一直被广泛讨论的问题。

假定构成集体的每个人毫无例外地关心自己的幸福，那就能显而易见的证明，在个人努力付出很小的意义上，一种完全按需分配

的制度将趋于导致劳动的非最优应用。对于这种结论，没有任何奇怪或不寻常的。早在1875年，马克思就已经批判了德国工人党的“哥达纲领”，指出它忽略了基本动机问题。也许有些略为令人惊奇的是，由于完全根据劳动分配，劳动的应用也是非最优的。那种制度将使人们承担过多的劳动，因为工分赋予他们对总生产的一些部分的“权利”（并不只是对边际产生的权利）。只要他们没有具备完全的“社会意识”（表现为重视他人的利益就如同他人重视自己的利益的形式），甚至当人们并不自私而且关心他人的时候，这两种制度的直接后果（也就是说，按需分配下过少的努力和按劳分配下过多的付出）都是现实存在的。

部分按劳动、部分按需要进行分配的最优规则是容易推演的。非常有趣的是，这个规则与人们相互间已有的实际“同情”程度没有关系，尽管由非最优规则而来的损失的大小将会由此产生变化。可是，在完全的“社会意识”的特殊情况下，任何按劳付酬和按需付酬的分配规则都会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就是在这类集体分配的结构内，那些使得纯粹按需分配失败（正如在马克思计划中的共产主义早期阶段）的因素，也会导致按劳分配没有效率。只有与完全的社会意识一致起来，劳动取向的分配——如同需要取向的分配一样——本身才会是适当的。

在撰写论文2的那个年代（1964—1965年间），本杰明·沃德（Benjamin Ward）关于“市场工团主义（market syndicalism）”的前沿性研究，已经开始再一次引起了人们对于纯集体分配理论的兴趣。^④在沃德的模型中，每个人的工作是确定的（集体成员数量被作为变量进行研究）。论文2的主要论点是要着手处理各种各样的努力以及与之相关的激励问题。

论文3所着手研究的这些问题同某些一般行为问题紧密地联系着，这些行为问题已在《理性白痴》以及其它的已收入我的《选择，

福利及量度》中的论文里进行过讨论。我不打算在这里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但值得强调的是，道德激励问题并非只是集体分配所专有的特征。的确，资本主义在一个有着浓厚服从习俗的国家（最明显的是日本）的相对成功也强调了这种需要，即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动机需要，给予一个更加复杂的观察（论文3）。

顺便说，这个问题在这个国家具有一定程度的现实重要性。我写这篇绪论时，我看到撒切尔夫人的一位资深内阁部长的讲话：“我们正在寻求建立一个企业家社会，在其中，追求利润是这种制度的动力，个人报酬是基本的刺激。”^⑤假定在现代生产过程中存在着普遍的相互依赖以及团队工作的重要性，那么结果就极有可能是，这段并非无意义的话中的智慧比其看起来要逊色的多。一种空想的信条不需要接纳为现实的信条，这恰恰是因为这种信条是拙劣的。

2 孤立与社会投资

2.1 集体理性和社会选择

一致的和冲突的利益的重合使集体行为中的激励问题更为复杂和丰富多彩。其中一些问题可以根据某些著名的博弈而富有成效地进行研究。基于适当的理由，已被广泛应用的博弈就是所谓的“囚徒困境”。^⑥尽管在论文4里（《论优化储蓄率》，1961）对储蓄次优的分析没有援引“囚徒困境”，但在事实上，那篇文章（以及后来在论文5里）关于“孤立悖论”的讨论就是把囚徒困境扩展到一种 n 人世界的例子。在特殊指定环境下，每个人都在打算为未来一代多储蓄一些，假如这也是引起其它人多储蓄一些的条件，但实际上，无论其它人怎样做，他自己都不会去储蓄。所探求的是一种契约性的解决办法——借助公共投资。社会契约被视为一种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其施用问题也由于那种事实得以简化，即每个人都准备投票赞成一项义务捐助项目（即使没有人自己会去捐助）。这样，卢梭的

“共同意志”便离开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而发挥了作用。

可以争论的是，分析该问题的这种方法由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原因而变的完全无效。首先，将不会明显地只存在一种优于公理结果的契约结果，而是有许多这样的结果——每一个结果都被所有人偏好为无，但它们本身却被不同的参加者给予了相当不同的排序。这就是J.F.纳什所称为的“讨价还价问题”的博弈类型。合作能改善每个人的命运，但改善程度却由于不同的合作办法而有不同。因此，由于合作愿望的缘故，可能会产生冲突问题——或许是剧烈冲突。这就使达成一种一致同意的合作方案过程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困难，即使是在交流和共商是可能的以及实施也有保证的情况下。^⑨正如我已打算在其它地方所讨论的，建立在囚徒困境和孤立悖论基础上的集体主义理论在表明个人主义分配的无效率方面，较之于发展一种明确的集体选择方面，获得了更为巨大的成功。

在这里，孤立问题与社会契约都与“社会选择”的一般问题联系着，特别是与处理利益冲突和判断冲突的问题联系着。对“孤立”问题的激烈争论是在帕累托改善（Pareto improvement）原则的基础上进行。^⑩那种争论留给我们一个问题：即在各种帕累托改善（Pareto improvement）的契约之间进行选择。不去着手处理构成社会选择理论主要内容的那些复杂问题，就不会有任何真正的可能性来讨论有关公理失败的这些问题（以及某一契约结果的优越性）。除了面对斯密以外，卢梭还不得不面对阿罗。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必然地是不能解决的，正如阿罗在经典的“社会福利函数的一般不可能性定理”的简单解释中所经常建议的那样。阿罗定理（Arrow's theorem）表明了独特的信息结构和精确的规则性与能推理性需要的集合的基础上，获得一种社会选择体系的不可能性。前一种限制——即信息约束——是特别有限的。纵然信息限制完全与传统福利经济学（30年代以来所用的）

的信息基础相一致，但是人们也能争辩说，阿罗那个有深远意义的结果反馈出的一个主要信息就是拒绝那种限制。我已打算在其它地方讨论这些问题，这里就不赘述了。但是，在处理“孤立”（以及相关的投资计划和公共经济学）问题过程中，着手解决社会选择所面临困难的必要性确实值得加以强调。

第二个问题涉及动机和行为。在以公式表述孤立悖论和囚徒困境时，根据一种个人偏好顺序，通过从最大化方面进行理解，个人行为的本质就变得简单了。当然，这完全符合传统经济学理论，在这种理论中，那种对一种假定的个人顺序的永恒追求的假设也排除了重要的动机和行为的问题。人们可以看到，即使囚徒困境的参与人是道德的（而不是自私的）排序的最大化者——对不同的人，情况是不同的——同样的“困境”也会产生。真正的问题关系到个人行为和个人目标的紧密程度（而不管是自利的还是道德的）。“集体理性”的必要条件可能要求一种更为复杂的方法。“理性白痴”可能成为愚蠢的道学家，同样也容易成为愚蠢的利己主义者。

在相互依存情况下，社会对于个人行为的要求可能完全不止于修正任何个人的偏好排序（例如，在一种更为“社会”的方向上），而且可能包含着从制度上背弃对个人偏好排序的追求。自己对于他人的义务可能不仅仅要采取在自己的目标内考虑他人的利益（或目标）的形式，而且还可能要求一个人对自己行为的选择不能单纯地同自己的目标（即使是道德目标）相联系。这并不直接涉及到拒绝道德哲学家所称之为“结果主义”的问题，但是至少，它确实要求一种更为复杂的结果追求的指导性、战略性方面的方法。

在有关社会的分析中，相对于偏好的内容来说，行为的规则自然不是一个新问题。甚至现代经济学之父、被人严重曲解的亚当·斯密也争论说：“当那些一般的行为规则由于条件反射已在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时，它们在改正对利己主义的误解方面具有很大作用，

这些利己主义涉及到在我们的特殊情况下，什么事情是合适的以及适合去做的等问题”。^⑨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及其在社会行为中的作用的分析，与这些问题息息相关。这对集体行为，诸如阶级、职业群体和共同体等的行为，既有道德上的又有理性上的影响。

尽管对于“孤立”问题（包括在本书中重新发表的论文4、5）的讨论可能在提出某些重要问题上起到了一种有益作用；然而，作为一些探索，这些讨论还是有局限的和不完全的。这在（1）处理可能发生的社会契约之“非唯一性”问题的失败上，以及在（2）对动机和行为采取了过于简单的观点（符合标准经济学理论）上，尤其如此。

2.2 储蓄与贴现率

对于应用于最优储蓄和贴现的“孤立悖论”，已经有一场相当生动的辩论，为的是识别可能存在的私人储蓄的非最优性以及市场贴现率的非适当性。在这场辩论中，最后一节所讨论的更为普遍的问题（涉及到可能发生的社会契约之非唯一性以及反偏好行为的基本原理）并未获得充分考虑。讨论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到那样的问题上，即在假定的具有理性（以偏好为取向）选择的一种个体均衡的情况下，对于相关参数的边际值，如何能够适度地进行假设呢。针对某些对“森—马戈林（Sen-Marglin）结果”的批评（来自塔洛克、凌德、阿舍尔、哈伯格（Tullock, Lind, Usher, Harberger）及其他人），我在论文5中进行了讨论（《孤立、保险与社会贴现率》），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随后的一篇文章中，斯坦尼斯劳·韦利斯兹（Stanislaw Wellisz）争论说，尽管“森—马戈林（Sen-Marglin）结果”已经证实，个体的和集体的均衡储蓄率并不必然地相等——但是，依据任何先验的理由，我们都不可能断定，哪一种政治制度将导致更高的储蓄率”。^⑩与此相类似，彼得·沃尔（Peter Warr）与布莱恩·怀特

(Brian Wright) (他们——正如他们所慷慨陈词的那样——“毫不怀疑分析的效力，理性的兴趣，或者孤立悖论观点本身的潜在的社会重要性，或者其他类似的‘囚徒困境’分析框架的形式”)已反驳了“那种观点，即在一种出于慈善目的的私人储蓄与公共（或私人）投资并存的经济中，项目应该以低于市场贴现率的比率进行贴现”。^⑩

这些观点都非常正确，而且提出的问题也非常有意义。然而，在利用一些论据时，却存在着某种困难，因为这些论据需要一种内部均衡的存在，其中所有的相关的活动实际上都确实发生了。例如，韦利斯兹 (Wellisz) 的一种论据包括那种假定，即某人“有2万美元的收入，为其继承人储蓄500美元，为其非继承人储蓄400美元，但为慈善活动却仅仅捐赠1美元”，并且假设这是最优的，那么“他从专用于这四种活动其中任何一种的边际美元上得到了平等效用” (第664页)。^⑪但似乎相当可能地，这样的一些活动不能够完全把一种最优的私人均衡包含进去。为了（在其他事情上）包括有意义的“出于得利意图的私人储蓄”，沃尔 (Warr) 与怀特 (Wright) 也利用了内部均衡的特性。的确，那就是他们如何推导出“适当的贴现率就是市场率”。无论如何，“边际主义”方法论暴露出许多局限，但是进一步假定所有这些活动——包括捐赠在内——确实包含着（以一些非零值）各自的均衡，这决不只是对那种工作量的微不足道的增加。

至于社会贴现率，论文8 (《社会效益—成本分析中选择贴现率的方法》，1982) 表明，私人贴现率与社会贴现率间的差异——正如论文5所表述的——事实上是相当容易误解的，因为它们处理的并不是同一个人际间的消费构成问题。而且也容易发现，这种差异并不同于市场贴现率和社会贴现率之间的差异。的确，即使论文5 (以及“森—马戈林模型”) 的所有条件成立，社会贴现率仍然可能高于或低于市场贴现率。

论文8也探讨了基于社会贴现率选择的社会选择决定的本质。企图仅仅依据帕累托标准 (the Pareto criterion) 来回避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 其理由已经在前一节中进行了讨论。当明确面对社会选择问题时, 它们就被认为不仅涉及了效用的得到或损失的问题, 而且涉及到公平和权利的问题。在其他方面, 环境问题也突出地包括了这种讨论。

本节中的其它两篇论文讨论了非常不同的问题。论文6 (《最终资本和最优储蓄》, 1967年) 关心的是用公式表示有限范围的最优积累活动的问题, 和支持使用最终边际储蓄而非最终资本存量方法。这种论据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最终资本存量的选择, 这些结果的变动相当的大, 而且我们也不会先验地知道, 被指定的定期资本存量是否在直接地超出所指定范围的消费中, 将足以避免下降的必然性。如果把最终边际确定在一定的非负水平上, 可以保证——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不会出现任何这样的必然性, 而且更进一步地, 结果是, 就某些在文献中^③已被普遍考虑到的实际的和评价的参数的值域来说, 由于一定时期的范围的实际变动, 已确定的定期资本存量将在相当精确的限制内进行变化。当然, 这些选择根本上是政治考虑, 并且包括了早先提到的所有“社会选择”的困难。但是, “如果人们趋于同意那样一种价值判断, 即在直接地超出这种范围的消费中, 未来下降的必然性应该避免”, 那么, “定期资本存量的选择就会变得简单多了。”

论文7 (《关于资本理论的一些争论》, 1974年) 是对一场重要争论的简单的尝试——关于综合资本的测度和应用——但这种尝试没有达到专业人士要求的那种严肃水平。尽管这种尝试无疑地受到了种族划分缺陷的妨碍, 但论文7还是提出了一种怀疑的观点。